

论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流变与缘由

陈松青 黄丽俐¹

【摘要】:作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重要分支,湖南文章总集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它发轫于宋代,经过元代的短暂沉寂,在明代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清代以来,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数量大幅增长,编纂形制多样化,卷帙普遍宏大,并逐步建构起类目清晰、层次分明的编纂体例,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编纂者广事搜罗、奋力钩稽的因素众多:其一,鹿续文脉,自发搜文;其二,采求阙文以补方志;其三,弘扬地方文学;其四,不甘落后的竞争思想。梳理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发展脉络,解析其编纂缘由,对湖湘文学发展体系的建构以及地域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章总集 编纂 类型 流变 缘由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675(2020)06-129-08

蒋寅在《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说:“与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不断涌现,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1]近年来,云南、贵州、安徽、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关于本地的诗文总集研究,湖南文章总集作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重要分支,却未得到重视,缺乏整体上的清理和宏观上的把握。本文试图爬梳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整体脉络,通过探究这一流变轨迹,指出并分析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深层缘由,从多维度对这一编纂现象进行阐释和解读,以期进一步完善对湖南文学发展体系的梳理与建构,推动地域文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随着地域文学文化研究的渐兴,关于地域总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各家对地方总集的定义和划分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先对“湖南文章总集”进行具体的概念界定和分类。

一、湖南文章总集的界定和类型

较早对湖南文章总集进行界定的是蒋江龙《湖南历代地方艺文总集述略》一文,将“湖南地方艺文总集”定义为“湖南人士的诗文总集或作者虽非尽为湖南人,但诗文内容皆关乎湖南地方者”^[2]。这一说法客观准确,但稍显简单。“湖南文章总集”作为“湖南地方艺文总集”的一部分,对其予以界定应更具体翔实,且符合实际的文献情况。

湖南文章总集属于地域总集范畴。从体裁来看,所收文体以文为主,包括骈文和辞赋,如欧阳厚均辑《岳麓文钞》《岳麓赋钞》,以“文”命名却兼收诗词的总集也可囊括在内,如陈楷礼辑《常德文征》,收录诗、文两类;从时段来看,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由来已久,《湖南文献概论》认为宋代龚元正所编《桃花源集》是“目前所知最早由湖南人编纂的地方艺文总集”^[3],但已失传。现存最早且保存较完善的湖南文章总集是明代黄焯所编《朝阳岩集》,此集收录历代有关朝阳岩之诗文题刻,内容包括铭、记、志、游题短记等七部分。清代是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繁盛期,不仅有一省之文章总集《湖南文征》,还有各府县地方之文章总集,如《常德文征》《常宁诗文存》等,以及占比最大、数量最多的课艺文章总集,如《湘中校士录》《沅湘通艺录》《沅水校经堂课集》等。

¹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的辑纂与价值研究”(编号:CX20200494)。

作者简介:陈松青,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黄丽俐,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考虑到民国时期文集编纂较多地承续前代的做法,不仅有郡邑类文章总集如《都梁文钞》《淑浦三贤诗文钞》等,还有一家之文集如《马桥唐氏文征》《枫田耆旧集》《衡阳左氏家集》等,虽然在数量和种类上不能与清代相较,但这一时期编纂的湖南文章总集大多体例完备,尤其是一家文集的编纂和保存,较前代更为完善,可酌情纳入考察范围。总之,我们认为,“湖南文章总集”是指收录湘籍作家的文章总集,如《湖南文征》《常宁诗文存》《武陵文征》等,也可以是以湖南地域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总集,如《岳阳纪胜汇编》《岳麓文钞》等。

关于文章总集的分类,各家划分标准不一。《贩书偶记》分为文选、各朝文、地方文、家集、课集五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为丛编、通代、断代、地方艺文、家集;《中国古籍总目》分为丛编、各体、分体、通代、断代、郡邑、氏族、尺牍、课艺;《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文选、历代、郡邑、外国、氏族、唱酬、尺牍、课艺;《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分为地方艺文、家集、杂录三类。可见各家分类方式大同小异,也各有合理之处。夏勇《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一文,以地缘属性为依托,把地域总集分为两类,一为典型的地域总集,即地缘属性为相关总集唯一的首要特质,如省域、郡邑、家集类;一为特殊形制的地域总集,即相关总集拥有双重的首要特质,地缘属性为其一,如闺秀、课艺、谣谚类。^[4]这一论断客观具体地理清了地域总集的边界,使其范畴获得了确切厘定。

着眼于湖南文章总集,既需要借鉴前人的分类方法,更需要结合湖南文章总集的具体情况,主要可以划分成五类,分别为省域类文章总集、郡邑类文章总集、宗族类文章总集、课艺类文章总集以及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

二、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流变

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现象,地域总集的编纂历史悠远。唐五代人编纂的地域总集大抵在五种左右,宋代不下五十种,元代至少有七种,明代至少一百三十种,清代则可能在一千种以上。^[5]唐代殷璠编选的《丹阳集》,被认为是地域总集编纂的起源。到宋元两朝编纂渐多,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代至民国,地域总集的编纂臻于鼎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与地域总集编纂的总进程相比,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稍显延滞。它发于宋代,经过元代的短暂沉寂后,在明代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清代以来,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在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成熟阶段,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 宋代:发初期

地方文学的发达程度影响着地域总集的编纂。宋代文化发展的地域性差异明显,其中北方京、洛地区和以成都、梓州路为代表的四川地区以及东南的两浙、江西、福建等地区发展最为突出,成为重要地域文化中心;^[6]文章总集的编纂活动也最为活跃,辑有《成都文类》《吴郡文粹》《会稽掇英总集》《宣城总集》等。而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中南地区由于土旷人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不发达,^[6]文章总集的编纂在数量和形制上也无法与其他地区比肩。

湖南人编纂文章总集的传统肇始于五代,桂阳刘赞编《蜀国文英》八卷、《分门文集》十卷^①。这些文章总集在内容上虽与湖南无关,但也能说明湖南人编纂文章总集的意识萌发较早。至宋代,湖南文章总集逐渐增多,北宋武陵龚元正所编《桃花源集》,辑录“古石刻文及诸家题录”^[7],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由湖南人编纂的地方艺文总集”^[3]。受其影响,又因“异人逸士多寓焉(指桃源)”^[7],故四明姚萼编纂《桃花源集》^②,收录“嘉祐以前诸公诗文”^[7]。其后又有南宋赵彦臻、张栋合编《桃花源集》^③,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此集分为上下卷,上卷为赵彦臻对姚萼《桃花源集》的重编,下卷为淳熙以后续编,收录晋、唐、宋朝诸公诗文。此外,《宋史·艺文志》记载,郝麓编有《都梁集》十卷。可惜宋代编纂的这些文章总集皆未流传于世。

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虽可上溯至五代,但这一时期并未出现代表性文集,更多的是文集编纂意识的萌发。宋代才开始出现内容关乎湖南本土的文章总集,但编者多将目光投注于整理前代文学作品,对本朝文人作品的关注尚有不足,且所涉地域范围狭小,集中在县一级,卷次内容较单薄。凡此种种,都有待后人进一步开拓。

尤值一提的是,元代湖南文坛“短暂而绚烂”^[8],出现了冯子振、欧阳玄等著述丰富的文学名家,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经过宋代的发朝后,在元代处于停滞状态,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

(二) 明代:发展期

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在明代有了突破性发展,且成果丰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种类多样化。既有着眼于湖南省域的艺文总集,如湘潭周圣楷编《楚才奇绝》三十卷;又有郡邑类文章总集,如黄焯所编《朝阳岩集》,收录了历代有关永州朝阳岩的诗文题刻,所收文体虽不限于文,但以文为主,包括铭、记、志、游题短记等。又如天长王心为补备《郴志》,与郴州诸生袁大邦等“集古今之文为郴而作者”^[7]编成《郴州文志》七卷,在体例上仿真德秀《文章正宗》。相对而言,课艺类总集在明代虽称不上繁盛,但已有编者将目光投注于此,如万历年间钱春编纂并刊刻《湖湘校士录》八卷,“于各府、县取录前列之虞、增、附生所试时文,详加评鹭。其文体清畅,确是场屋中本色……此类试卷,自明以来,风行坊肆间者,何啻千百,而存者仅此”。^④

第二,对前人所编总集进行续补。钱塘冯子京编《桃花源集》,是对宋代赵彦琦、张栋所编《桃花源集》的补缺,并增辑了元、明作者的相关作品。当涂梅淳编纂《岳阳纪胜汇编》四卷,钱塘张振先作序并刊刻^⑤,因旧集“诂次芜乱,纸漏复多,不足传远”^[9],所以“取旧集汇为一编,以洞庭为主,君山次之,楼居附焉”^[9]。这一做法既是对前人作品的整合编排,又在内容上进行了增补,如杂记由二十余则增至五十余则。此集虽然卷帙规模并不宏富,但其体例完备严谨,书前有凡例,论及编排缘由及体制,简要精当,总目之后编有《历代姓氏爵里》介绍作者,后以文体为区分标准设置总目,并论及篇数,为现存明代湖南文章总集中的翘楚。同属此类特征的文集还有周沈珂父子辑《周氏遗芳集》之于周冕辑《濂溪遗芳集》,祁阳陈斗辑《订补涪溪集》之于黄焯辑《涪溪诗文集》,王夫之辑《莲峰志》之于真定辑《莲峰翰墨志》等。

较之前代,明代湖南文章总集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多,地域范围逐渐扩大,体例设置不断完善,且在整理前人遗迹的同时也关注到本朝作者之文。但深入细化到文集编纂的各个层面,仍有颇多不足。就编者身份来看,多为寓湘宦宦,如黄焯于嘉靖年间任永州知府、湖广左参政,冯子京曾官任湖广按察司。这说明文集的编纂大多出于官方思考,编纂风气并不在民间盛行,也说明明代湖湘人还未清楚认识到湖湘文章的自身特色与价值。再就地域范围来看,它的触角远未覆盖全省,也没有深入到各地方,虽编有省域、郡邑类文章总集,但因明代并未将湖南单独立省,所以总集编纂时,所收文章作者地域范围无法界定到湖南省,而且编者多以名川胜地为收文范围,其他府县乡镇类文章总集寥寥无几。

(三) 清代:繁荣期

明清鼎革之际,湖南地区对满清统治的反抗比较激烈,战事迁延,对经济文化各方面冲击较大,直到康乾时期,湖南文学逐渐复兴,至近代,湖湘文风鼎盛,才人辈出,湖南文化的特色彰显于世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0]相应地,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在清代尤其是清后期,各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这一态势延续至民国。

1. 地域范围扩大。明代及其前代,湖南文章总集所涉地域多为名川胜地,地域范围有所局限。清初湖南独立建省,在总集(尤其是一省总集)的编纂上,更加突出地域性和规范性。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并深入,且各层级均有发展。

罗汝怀所编《湖南文征》是唯一一部涵盖湖南全省的文章总集,李瀚章称其为“楚南文献一巨观”^[11],并“与沅湘诗集并垂天壤间”^[11]清初廖元度开始整理楚地文献,并编有《楚风补》《楚诗纪》等与湖南密切相关的诗文集,但内容并不限于湖南。道光时期,邓显鹤编成《沅湘耆旧集》,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湖南诗歌总集,但此集“存诗而不及文”^[11],且“湖以南作者林立,独未有专书”^[11],《湖南文征》的刊成填补了这一空缺。

除一省文集的编纂外,府、县等各层级文章总集的编纂活动也相当活跃。如杨丕复编、杨彝珍续编《武陵文征》,收录宋代以来武陵人士之文;唐训方辑录《常宁诗文存》,收录宋代至道光年间常宁人诗文;光绪年间,蓝易辑录《昭陵赋钞》。民国间也

有不少此类总集,如《都梁文钞》《南岳诗文集钞》《激浦三贤诗文钞》等。

2. 数量种类增多。有清以来,湖南文章总集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题材内容多样化,除前代已有的省域、郡邑、课艺类文章总集外,宗族类和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也付诸梓行。

宗族类文章总集的数量在晚清及民国有显著增长,参照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序录》,清代家集 1244 种,湖南 53 种^⑧,属湖南宗族类文章总集的有 10 种。但据笔者粗略统计,此类总集数量应多于 10 种,约有 15 种,多为家族后人或关系亲密者编纂。譬如杨基善辑《杨氏先嫩录存》,吕家驹题讳,后有吴学澄跋,收录杨氏始迁滇祖克勤公至十五世和甫公之遗著;湘阴左钦敏撰辑《孝思集》,内容涵盖较广,包括遗事、墓谱、祭文、遗文、寿序等;此类文集还有《派江廖氏三代文钞》《湘阴丁氏文集》《谷口三张遗集》等。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在卷帙规模上不能与其他类文集相比,而且诗歌总集居多,但深入探究此类文集有助于考察文人的交游网络,探析湖湘文人群像。此类文集有《资江輿诵》《沅陵輿诵》《輿诵录存》《淮海咏归》等。

清末张百熙在《成均课士录叙》中有言:

自明人《钩玄录》之刻出,程墨行卷房稿日兴,由是诸生会课所作,社稿林立。评点则始自王房仲。今试士课士文犹习明俗不改,国学旧事课艺,积数年一刻。乾隆六十年,法梧门先生官祭酒,刻课艺第一集,嘉庆九年又续刻焉。当其时,海内承平,天子右文,肇兴辟雍,立石经东西讲堂,宏生巨儒,接踵辈出。而国学课艺,皆应举之作,不登解经论史诸篇,岂非朝廷取士所在,先其尤亟者乎?尚犹明人房刻之遗风也。^[12]

清人在继承明代人编纂课艺总集传统的基础上,更将此类总集发扬光大,湖南课艺类文章总集的发展也与此同步。明代钱春辑《湖湘校士录》,是现存较早的湖南课艺文集,此类总集在清末尤其是光绪年间大放异彩,占比最重,数量最多,可细分为书院课艺和科试制艺。如《船山书院课艺初集》《岳麓书院课艺》《东山书院课集》《城南书院课艺》等为单个书院的课艺文集,也有《湘中校士录》《湘雅扶轮集》《湘省课艺初集》等选辑多个书院的士子制艺之文编为一集。科试制艺类文集主要以省或府县为收录范围,如廖寿恒辑《湖南试牍》,选编同治年间湘中学子应试之文;张亨嘉辑《湖南校士录》,选录湖南士子应试佳作编成文集;又如陶易选编《衡州试牍》,为衡州生员应试文集。

关于文集的种类,还需注意两点。其一,有一部分文集兼有宗族和课艺的属性,如《敬止斋文抄》《邵阳谢氏艺文》等,主要收录一家或一族的课艺应试之作,编纂这些总集是“仿邑乘而增艺文一类,以点缀谱牒也”^[13]。可见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家谱,具有鲜明的宗族属性,因此,这些总集均可视作宗族类文章总集。其二,晚清湖南名贤辈出,便有学者收录他们的手札或书牍编成文集,譬如何天柱编《三名臣书牍三种》,收录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书牍;郭庆藩编《名贤手札》,主要收录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沈葆楨、李鸿章等八人信札;又如《近代湘贤手札》《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多收录湖湘贤士或重臣的手札。但因这类文集数量少,无体例可言,且不易阅读,所以并未被纳入归类范围。

3. 规模趋于宏大。清代所编湖南文章总集的卷帙规模远比前代宏大,尤其在收文数量上,更是对前人有所突破。明代梅淳编纂《岳阳纪胜汇编》,收录作者 408 人,作品 863 篇,杂录 53 条,其中文章仅 45 篇,但在明代已属收文较多的集子。而在清代,比之规模宏大的湖南文章总集极为常见。如朱光恒辑《激浦三贤诗文钞》十三卷,仅收录舒煮、严咸、向师棣三人的诗文,便已得文 107 篇;安仁欧阳厚均辑《岳麓文钞》十八卷、《岳麓赋钞》三卷,上起唐朝,下迄清朝,历时千余年,收录与岳麓山相关文赋 129 篇;刘国干等编纂《都梁文钞》,收文 160 篇;唐训方辑《常宁诗文集》十二卷,收录作者 214 家,诗文共 677 篇。

清人所编湖南文章总集在卷帙规模上,对前人有较大超越,更有一部分文章总集甚至达到收文上千的规模,是地方文章总集中的典范之作。乾嘉时期武陵陈楷礼辑《常德文征》,“成书四十八卷。此在各省、府、县先有为之者,而在郡中实为创举”^[14]。此集“下以征土风之共操实,上以征文教之广暨也”^[14],收录作者 286 家,诗文约 2600 篇。同治年间罗汝怀编纂《湖南文征》两百卷,辑录“自元明迄今六百余年,名臣魁儒,才人节士之文,采摭略备。计文四千有奇,作者八百人”^[11]即收录元明作者共

计 200 人,文 1189 篇,清代作者 589 人,文 2879 篇(含附文)。^⑦

此外,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的纂修规模也比前代宏大。清以前的文集一般纂修人员较少,且不见具体记录。清代以来,湖南文集的编修人员逐渐增多,以确保总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岳麓文钞》由欧阳厚均初编,再由肄业诸生分卷校勘,师生“翕然同心,共襄厥成”^[15]。又如陈楷礼辑《常德文征》,在《凡例》之后有《纂修〈常德文征〉姓氏》,以此详细记录纂修人员官职和姓名,包括鉴定、同定、总纂、总校、汇稿、考订、采访、分校、校刊等共二十八人。足见纂修之严谨与周详。

4. 编纂体例臻于成熟。明代人在编纂湖南文章总集时已注意到体例的编排,《朝阳岩集》在目录设置上先依文体设铭、记、志等一级类目,再按作者朝代的先后设置二级类目。梅淳《岳阳纪胜汇编》体例较完整,但其作者小传十分简单,仅包括籍贯和所处朝代,且目录设置并不清晰规范,这些都有待完善。清人在继承明代人编纂传统的基础上更注重文集体例的编排设置,使之臻于完善。

从编选范围来看,一方面,更注重作者的地域性,尤其是部分郡邑类总集,如《常宁诗文存》专收历代常宁人作品,《常德文征》以收录常德作家为主,因“桃、龙、沅采访耳目未周,入选差少;武陵密近,收录颇富”^[14],所以武陵人士作品最多,并且,与多数地域文集相同,设置“流寓”一类收录寓湘人士之文。另一方面,选文宽严相济,更重视作品的保存和传流。《常德文征·凡例》曰:“抄古人作从宽,其传久远不可多得;抄近人作从少,传者尚众,俟论定于异时。”^[14]刘国干为《都梁文钞》作序时也有言:“宝吉光,珍片羽。”^[16]

从体例编排来看,除少数抄本整体编排略显杂乱外,大多文集都类例明晰、著录有序,远非前代可比。其一,清代所编湖南文章总集中,作者小传(或称作者小志)更为详细,包括入选作者的字号、生卒年、生平仕履与创作,以及编者或他人对其的评价等。如《常宁诗文存》等将关于作者的总括性介绍附于其姓名之下,小传也因此贯穿文集始终。其二,卷次编目更为规范合理、井然有序。如《常德文征》“以名宦、流寓之作为一集,郡中先辈之作为二集,其人现存者为三集,依类分录,用《昭明》选文之例”^[14],《都梁文钞》“诗文分钞,按时代厘为六卷,不以体例分别部居”^[16],又如《枫田耆旧集》“前刊分三卷,首杂文,次诗词,次尺牍,兹用四库书例……前所录篇什,系分类而编,兹以人为经,各人所著,各录一帙,略以年为先后”^[17]。

欧阳厚均在《岳麓文钞·叙》中曰:

爰择集(指《岳麓志》)中诗古文词,芟繁去冗,录而存之。复就见闻所及,加以咨访,上溯唐宋,逮于国朝,凡宦寓名贤,钩游髦士,题咏传记诸作,悉与钞撮,按时代之先后为编次。其中之古迹名胜,为之寻流讨源,考其沿革兴替,一一疏证之,附以按语,俾后之修山志者采择焉。至于作者姓字爵里,可考者详之,亡考者姑略之。^[15]

清人编纂湖南文章总集时在体例的编排、篇目的分布上有较大进步,不仅体现在目录的设置上,还在按语、注释等附件的编排上有所显现。《湖南文征》作为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的代表,编纂体例最为规范严谨,有其独特而鲜明的特质。一方面,卷次分明,分体编排目录。《湖南文征》二百余卷,其中首一卷,目录六卷,姓氏传四卷,元明文五十四卷,国朝文一百三十五卷,补编一卷。卷首有曾国藩、李瀚章作序,罗汝怀作《湖南文征例言》。作者小传集中著录,编为姓氏传,置于正文之前。正文包括元明文和国朝文两部分,所收文章先按朝代先后排序,再按体裁类别分卷排列,分别有疏、策、议、解、说、论、记、序、跋等。

另一方面,选文有所甄别。首先,与前人编撰文集存流寓之人不同,《湖南文征》中并未涉及流寓文士,仅收已故湖湘文人之作,作者构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沅湘耆旧集》和《湖南文征》出现之前,湖湘诗文总集上溯年代久远,且以楚地为范围,易流于芜杂。《湖南文征》在时间上从元明至清同治,空间上仅限湖湘地区,把湖湘文化从广义的楚文化概念中剥离出来,地域特征更为明显。其次,重情理之文,不事考据。罗汝怀深谙考据之学,但《湖南文征》“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11]。最后,罗汝怀收文旨在“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11],所以即使是一鳞半甲、只言片语亦予以收录。罗汝怀在编纂《湖南通志》时

就曾表示“新增之书又已不少，而旧刻之散失者当亦不少”^[18]，《湖南文征例言》也提到新刻一直在流传，故不妨寡取，反而旧刻已经散落，更当收录。所以，被一些地方文章总集忽视的单言片语“以诗见者，则征诸题下之小引……以书称者，则征诸帖中之跋尾”^[11]。

综上所述，经过清代近三百年的发展演进，清人编者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标志着湖南文章总集的全面繁荣，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编纂体例之严谨，皆非前代人所及，是湖南文章总集编纂历史上的最高峰。

三、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缘由

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历经宋代的发初、明代的发展，至清代的繁荣，其推动因素众多，择其要者，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康续文脉、薪尽火传。或因年代久远，或因兵燹流离，导致文献散佚甚至毁灭。当代学者徐雁平在《清代家集总序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统计了二百一十六篇家集总序，其中慢性损毁者六篇，毁于兵燹者二十四篇，并认为“战争对包括家族文献在内的文献破坏性最大”^[19]。湖南文章总集中，不少文献毁于兵乱，编者为了延续湖湘文脉，四处访求，竭力辑录，在保存先人文献的同时以期泽被后世。如《枫田耆旧集·原叙》云：“因兵燹流离，先人手泽仅有存者，不忍听其就湮，与草木同腐朽也。”^[17]因此“兹续衰辑诗、古文、词若干首，另刊为三帙，命曰《枫田耆旧集》”^[17]，以期后世“思其志意，闻其容声”“有感奋兴起流连慨慕”^[17]。《衡阳左氏家集·叙》曰：“衡阳左氏文名久播湖湘，曾几何时，而高文典册寝即湮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例故而左福承“奔驰西南，四出访求，心剿形摹，靡敢澹忘，游目所及，辄用著录，一簣成山……以文存人实以人存文也……免数典忘祖之消，亦深冀吾后人之引而勿替也”^[20]。由此可知文集编刊的经过以及搜文的不易，这是为了承继文化、延续文脉而自发且自觉的行为。

第二，采求阙文，补缀方志。章学诚《文史通义》有言，“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21]。可见方志与地方总集相辅相成，从而构建起地方文献体系。部分编者在编纂方志之余，为补其不足，而纂辑地方文章总集。明代《郴州志》“以辅《郴志》”^[7]。清人陈楷礼“以修志之余哀辑先辈诗文，为《常德文征》”^[14]，此辑“与《郡志》相表里，并有因事而存其文者，庶论世知人足备考证”^[14]。这种情况在宗族类文章总集中也频繁出现，编纂文集以补谱牒之不足，《枫田耆旧集》曰：“因老谱有艺文一卷，录先人著作，即陆士衡所谓‘诵先人之清芬’是也，然按《通志》所载，谱牒统于艺文，是艺文无人谱之例，故另刊《枫田耆旧集》……前刊遗漏者，搜罗而补之，后出者，续登之。”地方志的纂修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文章总集的编纂有着积极影响。

第三，保存文献，传扬地域文学。湖湘大地人才鼎盛，文学源远流长，文集的编纂既可以很好地保存文学作品，又能将一地文学的魅力传播于世。正如唐训方在《常宁诗文存·序》中所言：

顾吾独怪天之生文人也，既予以著作之才华，复靳其芳名之流播。其人生时恒多偃蹇困厄，所作诗、古文、词或迟之数十年而后传，或迟之数百年而终不传。致使鸿文巨制剥蚀于风霜雨雪之中，后之人求其断简残篇而不可得，不亦重可悲乎？吾常邑地钟九嶷之秀，水挹湘江之清，代不乏学士文人，踵生其间，及考其生平撰述传者，十无一二焉。因采之郡县志，访之亲友及其子若孙，先后搜罗，纂集成书，并略叙作者本末，俾后之学者开卷恍接。其言论丰采昭然，如日月云霞之在天，飞潜动植之在地，人人得望而见之，即人人得望而知之。^[22]

总集编纂者在感叹文献湮没的同时，搜罗遗文并编纂成集，以此感召后世，使先贤风采能久远流传。不少课艺类总集的编纂也源于此，乾隆年间，陶易任衡阳县令，感触其地“寿岳钟灵，蒸湘毓秀，代有伟人”^[23]，但“人心不古”^[23]，于是“集七邑之士，试之，簿书之暇，篝灯夜校，厘定甲乙，或吐属清新，或结体深厚……各成一家言，于此见全衡为楚人文藪”^[23]。

第四,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共收录总集 219 种,涉及 25 个省市地区,据编者统计,现存地方诗文总集(主要是明清)有一千余种。明清以来各地方诗文总集编纂数量普遍增多,一部分原因是地区之间不甘落后,竞相编纂总集。如《常德文征·叙》中有言:“正史而外,《文鉴》《文萃》同编;而方志之余,《诗抄》《诗征》竞刻。”^[14]而“常德数被兵燹,家鲜藏书,《四库书目》所载十余种,皆自江、浙诸省收献。如陈高吾、蒋道林诸家,本地皆无可求索”^[14]。于是陈楷礼历时二十年,辑录《常德文征》四十八卷。再如李瀚章《湖南文征·序》曰:“国朝有《粤西文载》《金华文略》《柘浦文钞》《垂棘续编》诸集是也。其书并录在四库,藏之名山。而湖以南作者林立,独未有专书,非阙典欤?”^[11]与其他地方进行竞争较量,以及不居人后的思想推动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进程,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思维模式的作用下,湖南文章总集才能发展至鼎盛。

总之,推动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原因很多,从时代氛围来看,自宋以降,整理乡邦文献渐次成为文人的责任和使命。他们广事搜罗,奋力钩稽,从而使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在经历宋代的发、明代的发展演进之后,在清代于数量规模、卷帙形式、编纂体例等方面呈现出繁荣、完善的局面。

注释:

①有关二书的篇名,《光绪湖南通志》中“《分门文集》”作“《分门诗集》”,是根据《宋史·艺文志》录入。但经查考,《宋史·艺文志》卷二。九著录“刘赞《蜀国文英》八卷、《分门文集》十卷”,并未出现“《分门诗集》”。关于《蜀国文英》篇名,据翟新明撰《〈崇文总目〉总集类校考》(《古典文献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72,187 页),张兴武著《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9—240 页),张海著《前后蜀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1 页);可以肯定刘赞编有《分门文集》和《蜀国文英》,而《蜀国文英》与《蜀国文英集》是否为同一书还需商榷。

②“姚孳”在《直斋书录解題》作“田孳”。经查考,《通志》《郡斋读书志》《光绪湖南通志》《浙江通志》等文献均作“姚孳”。

③“赵彦臻”在《光绪湖南通志》作“赵彦秀”。经查考,《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均作“赵彦珍”。

④此为叶德辉识语,见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755—756 页)。由此可见课艺文章总集在明代的繁盛,可惜流传于世者稀少,仅存《湖湘校士录》。

⑤“张振先”在《岳阳纪胜汇编》(明万历十三年刻本)的序言中作“张振元”,《岳阳纪胜汇编·历代姓氏爵里》中作“张振先”。经查考,《雍正浙江通志》《光绪湖南通志》《民国杭州府志》等地方志书均作“张振先”。

⑥两组数据均来自《清代家集叙录·前言》,包含总集和丛刊两类,湖南家集包括已阅家集数和未见、待访家集数,见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上》(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8 页)。

⑦以上数据来自《湖南文征·前言》,阙名者均不计,见罗汝怀编纂《湖南文征》(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参考文献:

[1] 蒋寅. 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5): 166.

[2] 蒋江龙. 湖南历代地方艺文总集述略[J]. 文史博览(理论), 2014 (10): 8.

-
- [3]湖南图书馆. 湖南文献概论[M]. 长沙:岳麓书社, 2016:76, 76.
- [4]夏勇. 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 (10): 77-81.
- [5]夏勇. 地域总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 45.
- [6]程民生. 略论宋代地域文化[J]. 历史研究, 1995 (1): 55-59, 59.
- [7]李瀚章, 裕禄, 曾国荃. 光绪湖南通志[M]. 长沙:岳麓书社, 2009:5131, 5131, 5131, 5131, 5131.
- [8]陈书良. 湖南文学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 217.
- [9]梅淳. 岳阳纪胜汇编[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 3, 3.
- [10]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湖湘文化述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12.
- [11]罗汝怀. 湖南文征[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3, 3, 2, 3, 3, 2, 3, 4, 2-3.
- [12]张百熙集[M]. 谭永耕, 李龙如, 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 2008:10.
- [13]徐雁平. 清代家集叙录: 中[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7:1079.
- [14]周德辉. 常德文征校注[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10, 14, 14, 14, 6, 14, 9, 14.
- [15]欧阳厚均. 岳麓诗文钞[M]. 邓洪波, 周郁, 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3, 3.
- [16]刘国干, 等. 都梁文钞[M]. 武冈: 湖南云山中学校, 1934 (民国二十三年): 2, 3.
- [17]夏受祺. 枫田耆旧集[M]. 活字本. 1933 (民国二十二年): 3, 1, 1, 2, 3.
- [18]罗汝怀集[M]. 赵振兴, 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 2013: 180.
- [19]徐雁平. 清代家集总序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J]. 文学遗产, 2011 (3): 126.
- [20]左福承. 衡阳左氏家集[M]. 刻本. 衡阳: 翼经堂, 1936 (民国二十八年): 叙, 叙.
- [21]章学诚. 文史通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91.
- [22]唐训方. 常宁诗文存[M]. 刻本. 常宁: 归吾庐, 1891 (光绪十七年): 1-2.
- [23]陶易. 衡州试牍[M]. 刻本. 衡阳: 崇文阁, 1763 (乾隆二十八年): 序一, 序一, 序二.